

14.18

東鄉縣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

第二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江西省东乡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87

42156/34
东乡县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内部资料

赠阅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东乡县委员会
赠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东乡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封面题字 舒 同
封面设计 熊绍庚

东乡县文史资料

第 二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东乡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东乡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3 2 开 字数：108000 印数：1500
1988年3月 印刷

目 录

悠悠乡情

——我四次拜访舒老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吴国辉（1）

东乡县水利建设的成就和经验

……………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（27）

东乡大办水利的回顾……………陈接福（41）

东乡野生稻简介……………蔡衍泉（46）

东乡土地革命概况……………政协文史办（50）

红军三次来东乡……………熊大怪整理（59）

红军宣传标语……………政协文史办（63）

苏区情歌……………于耕春等口述（86）

清末北路闹漕始末……………政协文史办（68）

民国初东路抗官斗争……………政协文史办（70）

东乡县立初级中学的一次学潮……………政协文史办（72）

东乡县基督教简介……………洪昌茂（75）

天主教在东乡……………政协文史办（79）

东乡历史大事记……………县志办（81）

东乡历代县官录.....	政协文史办(123)
古代人物传记选录.....	政协文史办(140)
政协东乡县第三届委员会简介.....	张德清(146)

悠悠乡情

——我四次拜访舒老的回忆

吴 国 辉

人们往往喜欢沉湎于回忆，我也有这个爱好，五十年代末到进入八十年代，有幸四次与舒老同志见面是难以忘怀的。虽然和他接触不多，但在短暂的接触中，舒老同志给人留下了亲切、和蔼的印象。这些，虽已事隔多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犹历历在目。我愿把他感人至深的乡情和思念全部亮出来，转送给读者们……

**我第一次见到舒同是在1959年8月，
他到庐山开会，顺路看望家乡，当时会见
的人很多，我是十分激动的**

壮丽的庐山拂起了金风。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。当时中共中央委员、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老同志出席了会议。会议结束，他顺路返回东乡看望家乡。这消息象长了翅膀，飞到了家乡的怀里，送进了家乡人民的心田……

吴国辉同志，原任中共南丰县委书记，1985年4月，调任中共东乡县委书记，现为中共抚州地委委员、中共抚州市委书记。

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，舒同同志真的回来了，多么兴奋呀！当时县委第一书记王珍同志外出不在家，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国庆、副书记陈接福等领导同志负责接待，我们政法三家负责同志被抽去做保卫工作。那时，我年轻，二十几岁，跑到最前头。我看到一位穿着鱼网短汗衫，脚穿尖皮鞋的老伯伯风度翩翩地来了，一来就跟县委领导同志握手致意。那有神的眼神，慈祥的面孔，使我心底不停地赞赏：“啊，舒同同志！你神采奕奕，身体多健康呀！”

这幸福的会见，人们无不投去羡慕的眼光。

“听说你要来，我们一吃过早饭就在等你呢！”

孙国庆、陈接福等县委领导同志紧紧地握住舒老的手。

“我从大革命时期离开家乡到现在可有些个年头啦。”

舒同边说边用手指比划着：“恐怕三十多年了。”

这天上午，在陈接福等一行十多人的陪同下，视察了县城的十字街口。走到乐思水家门口时（乐思水是舒同的亲戚，又是他大革命时期的朋友），舒老停下了脚步，欣喜地说：

“这就是我过去常落脚的地方。有一次保安团要抓我，街前街后围得水泄不通，我躲在床脚下，保安团一走，我就从后门跑了，真差个米呀！”说得大家朗朗地笑将起来……

走到迎春路左侧的小巷，舒老兴趣盎然地指着门墙上的招牌说：“国医李仲昌这几个字是我写的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我们感慨地说。

“这个招牌从写起到现在也三十多年了吧……那个时候，我真写了好多字！”

有人插了一句：“首长，你看新华书店不是正在拆吗？这几年搞街道建设，单位变迁，变化很大呀！”

一句话引出了他的兴趣：“对，对！街道建设快起来了，真是催人奋进呀。从1949年到1959年解放十多年了，东乡旧街早就要拆，拆得慢了”。

“步子是慢了点。”县委领导同志带着几分歉意。

“工业也发展不快，东乡要发展，非要搞工业不可。你们在我家乡搞了十年，建设还是不快哟！”他接着说：“当然，东乡这个地方过去很穷。穷是过去的制度有问题，反动派不为人民办事，加上东乡土地瘠薄，所以过去很苦。解放了，共产党是为人民，要为人民办事的。你们要把工业抓上去，把街道建设搞起来”。

是啊，把街道建设好，把工业搞上去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呀！

回到县委住处，惊动了很多人。大院内外呈现了一派热闹的景象。前来看望舒同的人一批又一批，跟舒同一起闹革命的一些老同志、老同学特地从乡下陆续赶来了。舒同的老同学小璜魏家乐庭玉，也出乎意料地来看望。乐庭玉回忆说，约在1937年至1938年，乐把舒同未婚妻（以后也来结婚）李骥由东乡送到延安，要找舒同。一打听，都说有舒同这个人，但不知哪里去了。当时分析，一定牺牲了。李骥听后很难过，不肯回东乡，就在延安参加了革命。解放后她一直在天津公安局工作。而乐庭玉从延安抵达西安时看到有张布告，就投考了国民党军校，被录取，据说当了见习排长，后来升到团副。他约在解放前夕（1948年）回到小璜老家。

由于前来看望舒老的有三、四十人，食堂特意杀了一头猪招待，县委院内到处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在会客厅里，舒同及其秘书谢华同志在县委领导的陪同

下，歇息了一会儿，秘书笑吟吟地说：“首长，今天你吃什么？”

秘书的话，猛地把舒同提醒了：“哦，今天在家乡，不吃鸡、不吃肉，我要吃家乡菜，标准的家乡菜！”舒同转头向县委负责同志说：“你知道哪些是家乡菜？”

“芋头、米粉！”县委负责同志回答着。

“还有……”舒老兴致勃勃地数着“芋头、米粉、干鱼则炒辣子、霉头腐、排骨炆萝卜……这些是东乡的家乡菜，我要吃这个！”

开中饭了，家乡菜端上来了。大家一会儿吃炆萝卜，一会儿吃霉头腐，一会儿吃炆芋头。舒同很喜欢吃芋头，一个一个吃得很多，边吃边请着：“来呀，炆芋头、霉豆腐，真好吃呀！来——多吃一点。”

见秘书扶着筷子冒吃，舒老就说：“你吃呀！”用筷子点着霉豆腐：“这个菜最好吃，最有味！”

秘书听说这个菜最好吃，就夹起一块霉豆腐直往嘴里塞（因为秘书是江苏人，没吃过霉豆腐）。

哎呀，咸死了……秘书还连声说：“好吃、好吃。”

舒老赶紧说：“哎呀，你不会吃，霉豆腐这东西，你一次只能吃一点点，注意品味嘛！”大家轰地一声笑了，笑出了眼泪。啊，家乡菜，牵起了舒同多少乡情和思念！使舒同心里涌起了多少感情的波澜！

一天下午，县委办公室主任鲁活能想请舒同写几个字，舒同问清写什么，就拿起一支笔，展纸濡墨，随手写了：

“中共东乡县委员会”，“共青团东乡县委员会”，“东乡县委机关养猪场。”等三块牌子，一气呵成。然后掂了掂笔说：

“怎么样？这字行么？”鲁活能连声说：“好，很好！好得很哩！”

“今天能给家乡写字，我的确很高兴。”舒同兴奋着。这真是心底花开，笔底神来，家乡重游，有字可赠呀！

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，是舒同同志告别家乡的日子。县委机关、各局负责同志以及各公社书记们共七、八十人，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门口，排成一长队。舒同同志怀着深厚的情谊，一个个握手告别，不论同谁握手，一般是问：你是哪里人？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工作？担任什么职务？等等。

告别开始时，由孙国庆陪同介绍：“这是某某同志。”由于孙是北方口音，舒同听不大懂，只介绍了一人，就不要他介绍了，要陈接福同志介绍。

当与当时东源公社书记万火炎同志握手时，舒同很有兴趣。

“你在哪里工作？”舒同和蔼地问，万恭敬地回答：“我在东源公社工作。”

舒同没听懂：“什么东源？哪里的东源？”老万怔住了。

陈接福解释说：“就是岗上积，公社化时改成东源的。”

“哎呀，岗上积就是岗上积，怎么叫东源？地名不要改嘛！”舒同一口气说下去：

“岗上积我熟悉，大革命时期，这里有个郑徽猷，最反动！他带人到处抓我，包围我，我逃跑了，抓我个屁！……”

轮到同我握手了，舒同问我是哪里人，我拘谨地回答：

“我是长林公社人。”因为我那时二十几岁，说话卷了点舌头，舒同爽朗地说：“你这个年轻人，不要打官话嘛！什么长林？打什么官话？你就是长林乐家人嘛！这个村庄很大，是全县最大的。”我涨红了脸，赶忙用标准的东乡话补充说：“对，我是长林乐家人。”这次握手，使我产生了一种敬慕的感情：舒老，他多么富有情趣呀！

舒老与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。送行的人恋恋不舍地站在队列里，直到舒同的小轿车车影消失了好久，人们还是不愿离去，翘首而望……

这天晚上，我撕下当天的日历，在上而用笔工工整整地写上舒同回到家乡的日期，“难忘的一天”。

二十八年过去了，县委大院的一些老同志至今还在念叨着那一天哩。

**我第二次见到舒同是在1983年9月，
妻子随同我去舒老家作客。在那诚挚的言
谈中，我仿佛看到一幅幅革命艰辛的图
象，听到了一曲曲悲而壮的歌声**

1983年9月10日，我应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邀请，去北京参加十省十一县的县委书记座谈会（江西就是我去一人）。机会难得，妻子从未到过北京，这次也随同我去了。

9月10日上午10点45分，我夫妻俩乘飞机由南昌抵这北京，住在北京农牧渔业部招待所。因为是第一次到北京，我带着通讯地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去了电话。舒老

的秘书周硕襄同志工作很忙，却非常客气地接了电话：

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“我从江西来，是舒同家乡的县委书记，叫吴国辉，请报告一下首长，能不能抽一点时间接见我？”

“好，我一定转告首长！”

不到一个小时，回了电话：“报告了首长，首长很欢迎，约你明天上午九点钟去首长家作客。首长交待由我随同车子前来接你。”接着，问了我住招待所房间的号码。

次日上午八点，接我的车子准时来了。周秘书亲切地说：“还有随从吗？”“没有，就我一人去”。我指着站在我身边的妻子说：“这是我的爱人，让她在这里”。

听说是我的爱人，周秘书连忙说：“你要去，你的爱人也一定要去，要不，首长知道会生气的。”

于是，我和妻子都上了小轿车一下子来到舒老的家。我放轻脚步，一进门就见舒老和他的孩子舒关关在会客室里，已起身打招呼了。周秘书介绍说：“这就是你家乡来的客人。”舒老笑着：“听说你们要来，老早就在这儿等你们了，好，好！……请坐！”舒老非常高兴看到家乡客人。

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舒同了，但来到北京舒老家作客，还是第一次。我自我介绍说：“舒老啊，我是东乡人，在隔壁的邻县南丰当县委书记，这次是来中央书记处开座谈会的。”“啊！……南丰我到过，第四次反围剿时我到过”。舒老又惊又喜，笑得嘴巴半天合不拢。

“舒老呀，这是我爱人，从未到过北京，我夫妻俩来看望你老人家。”我说，“为什么来看你呢？你是东乡的‘三个第一’……”舒老又“啊”了一声，挪动了一下身子。我

说明着：“第一，你是东乡党的创始人，是东乡县最早的、第一个共产党员；第二，你是东乡有党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；第三，你是东乡县委的第一任县委书记”。舒老笑笑，点点头。我又说：“东乡人民、东乡党组织对你老很崇敬，我虽然在南丰当县委书记，还是要来看望你老人家。”舒老很高兴地说：“好！好！。”

停了一下，我又说：

“舒老，我有工作证呐，你看看我是不是东乡人啊！”

“你还有工作证！”舒老两眼一闪一闪，带着快感说：

“不要工作证了，听你哇事就是东乡人嘛！”

呵，舒老真爽快，我高兴极了。二十四年前，我在家乡看到舒同，他是那样慈祥、坦率；现在到了晚年，还是这么爽朗、实在，这充分体现了舒老对人民、对家乡的深厚情谊。

在舒老家作客，我和舒老谈了近三个小时，我谈半小时，他谈二个半小时。他讲“革命难”的经历，使我很受熏陶，很受教育。

舒老说：“革命不容易。你晓得呗？今年我已八十来岁啦。”他说他在东乡参加革命时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。在火热的斗争年代，只是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满，对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欺压人民不满。后来在江西省立第三师范（校址在抚州）读书时，才受到革命的熏陶，受到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《独秀文集》等杂志的影响启发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做的坏事。那时革命没有工薪金，他和同学们都情投意合，常常聚集在一起，纵谈天下大事，一种爱国主义热情，冲击着他们。那时，对于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抨击是很激烈的。在客房

里，舒老谈起早年的回忆，豪迈地说：“对，我就是这样参加了革命。”

接着，他跟我谈起当年在东乡革命的情景。舒老总是那样敦厚、坦率，他讲：“你晓得噢？我几次差个米被捉到哩，要杀头呢！”他说，有一次他在岗上积，被反动派郑徽猷围住了，前屋出不去，他从后屋溜走了。又一次，他在岳父家（小璜魏家）躲了二个月，后来被发现了，又要抓他，又逃走了。第三次，在东乡县城乐思永家，躲在床脚下，敌人刚一走，他就从后门跑了。第四次躲在何坊，敌人还是没有抓住他。舒老说：“你看，几次都差个米……那时，我个子小，脑子也灵活，抓不得我到呢！”舒老自然地讲起了赵拔群同志，他说：“当时不是有个赵拔群吗？说是被国民党杀了，不是那样……”。据舒老回忆，1928年，他是东乡的县委书记；南昌起义后，他曾去南昌找朱德同志，同去的还有赵拔群等几位同志。不料朱德已离开了南昌，不知哪里去了。他们便回抚州，先后到崇仁、乐安、宜黄等地去找红军。那时，国民党反动派已发了通缉令，到处捉拿舒同、赵拔群等十多名共产党员。舒同和赵拔群只好向着余江、童家、弋阳、横峰方向，在深山里窜，饿了几几天几夜，摘“狗枸子”、“楠桐子”（乌饭）吃，实在太饿了，就煮野菇吃。一次不料吃到了毒菇，舒老胃口小，吃得少，没出什么问题；而赵拔群同志胃口大，吃得太多，中毒了，山下又全是敌人，来不及抢救，赵拔群同志遇难了，他只好守在赵拔群的遗体旁，哀痛地、沉默地坐了很久，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……舒老对烈士的情谊何等的深重啊！

舒老说他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。那时红军与国民党军

经常交战，是处在饥馑和困苦的年代。舒老的字写得很好，红军走到哪里，他就写字。红军要写的标语，多是由他写，行军起来，一放下包袱就写字。那时，没有墨，用红朱（山石的一种红石头）；没有笔，扎帚子写。舒老说他有一匹马，一天不写字，手就发痒，骑在马背上都写字。要怎么写就怎么写。山沟里的墙上，真写上了好多字。他说那时写字不要好，认得就行。

要讲舒老这一辈人的长征精神，是永远令人肃然起敬的。在那艰苦的年代里，他们茹苦负辛，舍生忘死，一点一点地播散着革命的火种。解放后，舒老仍然发扬了长征精神。他说解放后他是华东军区总政治部主任、华东局的宣传部长，同时担任了华东局委员、华东局教育委员会主任、上海大学校长等十一个职务。陈毅、徐世友同志对他很好，陈毅司令员很信任他，写什么东西——部队的、地方上的许多文件，都要他起草，晚上干到十二点，有时干到深夜三点，一天二十四小时恐怕干了十五个小时的事。舒老说：“陈毅同我关系好呢，我虽然劳累，但心情非常愉快。”

舒老不老，一讲起话来，还是头脑清晰，神情焕然。他的面型，他的体态，没有变化，只是头发花白了。从他的工作，他跟我谈起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带来的灾难。他说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为什么讲他是叛徒呢？一是说他在东乡革命时当了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长。赵拔群死了，而他并没有死，讲是他出卖了赵拔群。二是说舒老在上海革命时，他和乐典在国民党的一个盐局里，舒老是一个办事员，讲他是为国民党办事。舒老说：“赵拔群同志是吃毒菇死了，有的人怎么也不信；我在国民党盐局里做事，年轻人又不懂；那时，我没有公开身

份，又怎么革命？年轻人不懂这个。“舒老接着说：“我伤心极了，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我坐了八年班房，说我是叛徒、反革命分子、修正主义分子……坐八年班房，真吃了苦。我写了许多检讨，写了好多字。有的人不是要我的检讨，而是要我的字，写了一次又一次，先用钢笔写，后用毛笔写，写好后就被抢去了。每次写检讨我都有意见，每写一次就辩论一次，检讨的内容，全是一条一条的驳斥，造反派拿去也不看，就是要几个字，检讨没有个完”。

舒老这朴实的话，真是金石之言，掷地有声，这正显示了舒老的风格、骨气之如何可贵。

舒老说，坐班房他很痛心。石兰是他的妻子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迫于压力，也揭发他是叛徒。所以，舒老出班房后，未和妻子在一块，也未离婚。中央军委做工作，他想，作为妻子，他有问题是可以揭的，但不能没有事实地乱揭呀！他难过极了。

后来，舒老又谈起了在山东的事：“你晓得呗？在山东我犯了错误，撤了我的职，是受冤枉呢！”他说，当时中央路线出了问题，搞“大跃进”嘛，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。山东死了人，安徽也死了人，结果抓住他不放。他被撤职后，调安徽的曾希圣去接他的职。三年困难时期，舒老当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，老百姓每天吃八两米，而曾希圣一来规定吃五两米，山东人民还是说舒同好，曾不好，这说明安徽更有问题嘛！还是山东好。事情反映到中央，一查，果真安徽也饿死人了，毛主席知道了，不要他负完全责任。但那时，舒老已下放到山东的一个县兼县委第一书记，他说他只去过一次。后来毛主席发现了，亲自到山东找他谈话：“舒同同志，你不

要到那里去了，回来另分配你工作。对你处理重了。”舒老说：“不是重了，而是处理错了。”毛主席说：“重也好，错也好，你出来工作。”毛主席同他一起吃饭。以后中央通知他到陕西省当省委书记。舒老说：“毛主席还是好，错了还会改呢！”

舒老说得很起劲，着实很兴奋。他说：“你看看，革命多不容易！不是一帆风顺的！要坚信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。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缺乏经验，大家都缺乏经验，毛主席也缺乏经验，全党都缺乏经验。因此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就是坐班房，也要坚信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中说我是叛徒，反革命呀！坐班房，要判刑呀！我全不在乎。我很乐观，所以身体好，现在医生检查说我没有什麼大毛病；叫我写检讨就写检讨，没有纸，就拿报纸写，要怎么写，就怎么写，写检讨变成了痛骂。写字也能锻炼身体呢，要不然，大家都说你是叛徒，你想不开，就会吊脖子呢，要坚信共产党好，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呢！”

这时，舒老的孩子进来说：“不要讲了。”舒老说：“你晓得什么？！家乡的父母官来看我，难得呢！”

“好，休息十分钟。”舒老说，我和他孩子扶他到外面去休息。他还是侃侃而谈：

“高兴嘛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高兴，高兴！舒老呀，这次我主要是来看你……另外，想请你写几个字。”

“北宋时期，南丰有个著名文学家曾巩，我请你写‘读书岩’几个字纪念他。”

“今天不能写，要休息了。过几天我写好，给你寄来”。